

是不是自己人？

探討臺灣在 COVID-19 之後「反中」情緒 對女性陸配地方感建構衝擊

韓宇捷* 宋郁玲**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學士，通訊作者
E-mail: s1043007@gm.ncue.edu.tw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特聘教授
E-mail: yuling@cc.ncue.edu.tw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後疫情時代女性陸配對「自己是臺灣一分子」的身分認同議題。陸配是臺灣最主要的新住民群體，在族群與性別交織下的排除性，使她們形構出負面的地方感。過去的研究中，缺乏探討鄉村地方如何從認同上影響女性陸配於生存策略選擇。因此，本研究藉由中部某鄉村社會為研究場域，透過深入訪談13位受訪者，瞭解女性陸配遷移來臺的經歷，從日常生活與社交互動等各層面切入，得知女性陸配在疫情前／後的地方感差異，與她們在地方／國族認同的變化，用以認識她們的生存策略轉變。本研究發現陸配在疫情前後的生存策略選擇從「妥協自身」轉變成「隨遇而安」，說明了她們的地方感和地方／國族認同變化。通過長期的地方實踐與情感政治參與，多數陸配認同自己是「自己人」的論述，並期望後疫情兩岸能復航／直航，以及追求身分平等、兩岸和平，得以更友善地生存於臺灣社會。

關鍵詞：女性陸配、後疫情、反中、地方感、認同

壹、前言

近鄰於海峽 (strait) 一側的臺灣，長期與中國處在一種微妙地政治氛圍。歷經軍事衝突、相互對峙，終於在1987年開放兩岸交流，使得「大陸配偶」(Mainland spouse) (以下簡稱「陸配」) 在臺灣日漸成長 (趙建民 2023; Y.-C. Tseng et al. 2014)。隨著臺灣的政黨輪替，兩岸對於「國家」定位日益分歧。Y.-F. Tseng and Lin (2014) 也點出，民主進步黨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簡稱民進黨) 執政下的反中政治氣候，讓臺人和陸配在國族認同上逐漸不同。

2019年末在武漢省爆發的肺炎群聚擴散至全球，¹疫病危機感發酵於網路中，負面的公眾情感導致輿論將COVID-19引咎於中國之上 (Chakraborty and Bose 2020; Jaworsky and Qiaoan 2021; Luo et al. 2023)。Lyu and Takikawa (2022) 更表明，疫情前和中國發生過摩擦的國家，人民會因本土疫情爆發與媒體框架 (media frame) 設立而強化了反中情緒 (anti-China sentiment)。這套說法似乎反映在與中國逐漸交惡的臺灣社會，羅鼎鈞 (2022) 也用實例闡述陸配家庭於疫情期間遭到的社會排除 (social exclusion)。

然而，社會排除與兩岸對立並不是執政者樂見的事情。時任總統蔡英文在2021年 (民國110年) 度國慶演說使用「凝聚共識」、「攜手合作」、「善意不變」與「期待兩岸和緩」等論述表態執政立場，試圖回應上述問題 (總統府 2021)。但時至今日，共機繞臺事件仍然時刻發生，臺人對於中國、陸配的恐懼與排除依舊存在。可見，這複雜的兩岸現況是難以解決的。

1 從武漢擴散的肺炎名稱歧異，本研究為避免爭議，之後將使用2020年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訂定的COVID-19 (Coronavirus Disease-2019) 來代稱該肺炎 (疾病管制署 2020)。

身在反中情緒的後疫情（post-epidemic）社會，陸配明顯是個獨特存在的群體。或因政治、主權認同差異，陸配感到「失根」及「兩邊不是人」（楊婉瑩、張雅雯 2018）。而在現有的研究中，女性於個體移動（female mobility）上本就弱勢（Porter et al. 2021; Starkey et al. 2021）。成為新住民後，更要面對異地的挑戰，往往與性暴力（sexual violence）、歧視（discrimination）和父權思想（patriarchy）有所掛勾（Ottenheimer et al. 2022; Shankar and Northcott 2009; Zotova et al. 2021）。由此可知，女性移民的處境是舉步維艱，需要被大眾瞭解與為其發聲。綜觀以往女性陸配的研究，在人權、公民權的討論是較為完善（朱柔若、孫碧霞 2010；陳小紅 2005；陳宏 2018；陳志柔、吳家裕 2017；陳芬苓 2014；楊金發 2006；楊婉瑩、李品蓉 2009；楊婉瑩、張雅雯 2018；趙彥寧 2006）。卻缺乏從「地方」（place）的角度探討地方如何從認同上衝擊女性陸配的生存策略轉變。即使是討論後疫情的相關陸配論文（羅鼎鈞 2022），也未能補充。

對此，本研究會從女性陸配的角度出發，以「地方」（place）為理論基底，提出主要問題：處在後疫情時代的女性陸配，究竟對「自己是臺灣的一分子」說法認同與否？並依序發展出以下次要問題：

- 一、女性陸配在後疫情的臺灣，如何形構地方感（sense of place）？
- 二、女性陸配因為當前反中的社會氛圍，對臺灣的地方／國族認同產生什麼變化？
- 三、女性陸配如何在變化後的地方／國族認同中，轉變生存策略？

本研究圍繞在女性陸配的生命歷程，期望從她們的地方感出發，瞭解後疫情前後造成的認同衝擊，補充女性移民與地方關係的研究。

貳、文獻回顧

一、連結：從地方感到認同

地方的使用活躍於日常生活，然而早期學者對其認識卻為靜態。Lukermann (1964) 通過區域地理概念，指涉特定區位的自然與人文融合。而後地理學界受到人文主義 (humanism) 的影響，開始注意人與地方情感的聯繫，認為地方適用於價值 (value) 和歸屬 (belonging) 等經驗性討論，被認為得以容納過往記憶 (Casey 1987; Relph 2008; Tuan 1974)。

然而，當我們想清晰地表達自己對地方的感受時，似乎難以用「地方」一詞完整說明。「地方感」則能進一步定義這抽象且模糊的情境，代表著人對地方主觀的情感依附 (Agnew 1987; C. Y. K. Li et al. 2023)。更將其視為建構地方的要素，也包含了與在地社會、地理情境有關的社會建構和主觀福祉感應 (Hay 1998; C. Y. K. Li et al. 2023)。可見，地方感可以是從人的視角來瞭解地方，與個人主觀感受、直接經歷相關。對於瞭解女性陸配在臺的經歷，確實提供了重要的研究途徑。

地方感的認識論卻不僅於此，其與「身分認同」有緊密的關聯性 (宋郁玲、姜蘭虹 2008; 林嘉男、許毅璿 2007)。²但是在傳統地方研究與論述中，常被認為對性別缺乏關注，將女性 (主義) 視角邊緣化 (Linda McDowell 2006; Rose and Ogborn 1988)。張華蓀 (2005) 更點出，臺灣地理學界對於性別、女性的關懷不甚熱絡，缺乏女性視角

2 就如林嘉男、許毅璿 (2007) 整理地方感的相關研究，指出地方感常包含地方認同 (place identity)、地方依附 (place attachment) 和地方依賴 (place dependence)，分別對應於人之認知 (cognition)、情感 (affect) 和行為 (behavior)，正是參照 Jorgensen and Stedman (2006) 對地方感組成的想像。

的批判。即使地理學界經歷了多年的女性主義發展，性別議題仍具研究價值。據此，本研究以女性陸配的地方感來探討認同的議題，以補充性別缺席的地方與認同研究。下文將聚焦在人與地方認同的回顧。

二、認同：從地方到國族

當認同形塑於地方之上，是一種論證身分的途徑。Proshansky (1978) 作為先驅，定義個人通過有／無意識的模式來表達環境與身分關聯。藉由認知自我身分，地方認同更能指涉人們對特定地方的歸屬感 (belonging) (林嘉男、許毅璿 2007; Bricker and Kerstetter 2000; Moore and Graefe 1994)。只是，地方作為經驗容器，涵蓋的感受、身分向度多元，展開了地方認同不同的討論 (Casey 1987; Rose 1995)。政治地理學者開始研究地方是否能負載國族 (nation) 的身分意義。藉由想像共同體 (imagined community) 為基礎架構，陸續將地方設為研究場域，來討論國族地方感 (national sense of place) 的認同事宜 (葉韻翠 2021; Tim Cresswell 2006; Agnew 2002; Anderson 1991; Taylor 1999)。

當「國族」滲透於不同尺度的地方 (與空間)，政府則會試圖干預人與地方在身分上的連結。從官方主動賦予地景意義以建構人民的地方／國族認同，乃至民眾被動接受／主動選擇等施為，都揭示著人與地方複雜的身分鑲嵌過程 (陳蒨 2016; 葉韻翠 2021; 顏亮一 2006)。此脈絡下的認同研究更被晚近的情感地理學 (emotional geography) 所重視，並深掘多重身分歸屬下動態 (再) 生產／整合的可能：透過重視個體情感，承認情感與地方 (空間) 是相互生產的關係，以剖析跨域移民下的身分認同流變 (宋郁玲、陳金永 2017; 黃宗儀 2020; 黃宗儀、胡俊佳 2020; Davidson and Milligan 2004; Mazumdar et al. 2000)。

地方／國族認同與國家機器、政治氛圍的交互作用，更在遭逢跨域動盪時體現。地方藉由強調 (甚至治理) 國族情緒 (sentiment) 或情感 (affection) 之論述，動態修補國族邊界內的想像共同體，並

區分、貶抑特定國家或族裔人口 (Heimo et al. 2025; Hung and Chang 2023; Jaworsky and Qiaoan 2021; Yu 2024)。排除「他者」的討論，也出現在以往陸配研究之中。朱柔若、劉千嘉 (2005) 指出女性陸配認為政府由於「政治因素」的考量，使她們被差異對待；楊婉瑩、張雅雯 (2018) 談到儘管女性陸配跟臺人有同文同種的互動優勢，卻因政治對立而被臺人認知／政策劃界於「自己人」之外，使她們覺得相當矛盾。雖然從二者的研究中強調國族與身分認同的討論，卻缺乏國族認同與形塑地方感之關聯解析。只是國家政策的實施與兩岸政治的差異都讓她們感到身分排除，間接證實了人的認同會與曾經／現在所在的地方存在著某種聯繫。

三、回首：女性陸配在臺發展背景

陸配能移居臺灣，源自於1987年開放的兩岸探親政策 (趙建民 2023; Y.-C. Tseng et al. 2014)。根據公開統計資料 (內政部移民署 2025)，截至2025年1月，陸配人數 (不包含港、澳地區) 已經突破36萬人，是最大宗的新住民群體 (圖1)。而且在陸配群體中，超過9成是女性。然而，不管從國家政策或社會互動，陸配被接受的程度不如來自東南亞的新住民 (陳志柔、吳家裕 2017)。在法規制定下，陸配最快取得身分的時間是多於其他外配。³因此，處在差序對待的臺灣，陸配是值得被關懷的群體，以下更會分成三個時期來說明女性陸配在臺困難。

早期的女性陸配，被稱為「大陸新娘」，多少有貶低、物化女性之嫌疑 (朱柔若、劉千嘉 2005)。大眾媒體運用自身論述，模糊／錯置陸配形象的認知 (夏曉鵬 2001; 楊金發 2006)。⁴政府更對陸配

3 外配與國人結婚之後，至少要合法居留臺灣3年以上，並且每年居留滿183日，可以申請歸化國籍。而陸配早前取得我國身分是「數額制」，逐漸調整為「年限制」，現今至少要居留臺灣6年以上，方能去申請我國身分 (中華民國數位發展部 2024; 陸委會 2023)。

4 夏曉鵬 (2001) 通過建構論，批判媒體報導對外配錯誤的詮釋，以解析背後的權力運

臺灣新住民各國籍占比（截至2025年1月）

■ 中國大陸 ■ 越南 ■ 印尼 ■ 菲律賓 ■ 其他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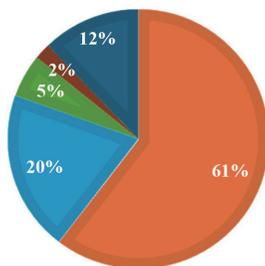


圖1 臺灣新住民各國籍占比（截至2025年1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移民署資料繪製

身分採取嚴格認證，以防範她們從事各式不法行動。⁵然而，就如陳小紅（2005）批評，不少非法打工或來臺賣淫的女性陸配，其實是透過合法的管道入境，政府卻多處置陸配，反而對引渡的人蛇集團較少管制。⁶可見，早期女性陸配不管是面對社會、媒體、政策上，都處在不友善的情境。縱使有犯罪的事實，卻多被放大檢視且片面解讀。這些身分隔離過程有意／無意地強調她們的特殊性，所以她們面對臺灣認同上，長期處於尷尬（in-between）的狀態。

作關聯。媒體藉由誇大現象、相互抄襲，引述／捏造（錯誤）官方說法、數據等情形以建構外配是社會問題的「真實性」，是呼應了楊金發（2006）發現陸配過往被大眾冠上「買賣婚姻」、「來臺賣淫」和「中共特務」的汙名化事實。

- 5 綜觀歷年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年報，更可以發現政府早期抱持著嚴格身分限制來處置大陸配偶，諸如民國八十九年年報便表態：「政府對於大陸配偶仍然採取『實質生活』從寬，『身分取得』從嚴的態度。」（陸委會 2000）；和民國九十六年年報指出，政府試圖「加強查察大陸偷渡犯來台、遏止防範大陸配偶虛偽結婚、清查大陸人民來臺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陸委會 2007，頁32）。這些官方措辭皆明晰呈現公部門對大陸配偶在人口移動和身分認可上採取較為保守的治理策略，進而主動「建構」陸配他者形象。
- 6 陳小紅（2005）指出，當時政府將婚姻定義為民間行為，對婚姻仲介的作為很難加以追查與管理，導致買賣婚姻的狀況日益嚴重；對於人口販賣的政策治理，也多以處罰被販賣的一方（即陸配），卻對罪魁禍首（即人蛇集團）較少處置與嚇阻，更導致臺灣在「假結婚、真賣淫」的情形日益猖獗，應當積極檢討與修正。

由於疫情導致國家的邊界閉鎖，特別對中國相關人士的身分管理，遭受了嚴格地差別待遇（朱凌毅 2020）。⁷女性陸配之於中國人／臺灣人而言，都不隸屬於「自己人」，勢必將遭遇更多挑戰（楊婉瑩、張雅雯 2018）。關於2020年的武漢春節加班機事件，政府公開質疑此作法為「完全走樣，下不為例」；網路上更有許多「仇中醜中」論述，不僅增加兩岸婚配難度，更打擊了陸配對臺灣人善良的地理想像（羅鼎鈞 2022）。所以陸配更需轉變生存策略，再次磋商多重身分來成為「自己人」（黃宗儀 2020）。

縱然我國一再強調以「家人」對待陸配（陸委會 2023），但無論政策、研究或論述，都呈現了女性陸配來臺後所遭遇的難題。然而，從前面的回顧中，能夠見著她們面對臺灣國族認同，會因為身分無法鑲嵌於地方，所遭致的社會排除。反中情緒在疫情下高漲，是否會衝擊後疫情陸配的地方／國族認同，進而轉變生存策略，是值得研究的議題。

參、研究架構

根據文獻回顧與研究提問，繪製出符合本研究的架構概念圖（圖2）。如圖2所示，任何事物的互動都是作用於地方之上，地方也是多層次的排列本質，所以陸配擁有不同的地方感連結。人不只會主動形成對地方的感受；地方上各個管道（諸如國家機器、社會關係等）的作用也會被動建構人對地方的感受，所以陸配與地方的地方感互動是雙向進行的過程。

本研究是在討論後疫情時代女性陸配的認同與轉型，採用地方理論來認識。在此框架下，陸配的地方感勢必影響於疫情爆發前後各管

7 根據監察院（2021）對疫情期間陸籍人士（小明、小紅案）入境管制之檢討，明確指認我國政府針對陸籍人士及外籍人士開放入境時間與待遇確實存在差異，應公開透明相關資訊，並避免歧視，遵循最小侵害原則。

道的作為。如文獻回顧所示，社會關係、大眾媒體和國家機器都在疫情期間，促使女性陸配捲入排除、貶低的社會氛圍之中。因此，本研究欲得知女性陸配在疫情前後的地方感與地方／國族認同，以及生存策略轉變，進而釐清她們對「自己是臺灣的一分子」說法認同與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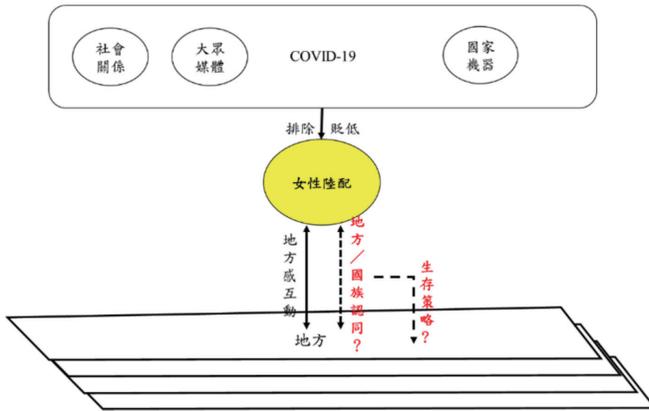


圖2 架構概念圖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深度訪談法 (in-depth interview)，透過半結構式訪談方式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討論她們位於地理想像較現代的臺灣邊陲地區，究竟對「自己是臺灣的一分子」說法認同與否。由於內容會牽涉到經驗和感受的回饋，適合採取質化研究取徑 (W. Lawrence Neuman 2014)。

本研究於2024年7月至12月密集在田野中進行深入訪談，受訪者的招募採用滾雪球方式與聯繫在地社團找尋13位符合條件的女性陸配 (表1)，以避免引薦者與被引薦者具備相似個人特質 (personality) 造成相近決策侷限 (Doroszuk et al. 2019)。其中除了亞惠、敏玲和紫娥3人是採取線上訪談，其餘受訪者皆採用實體訪談。透過主題分

析法 (thematic analysis)，剖析訪談的逐字稿，以主題的形式呈現文本間的深層意涵 (高淑清 2008)。

表1 訪談者基本資料

訪談者身分：豐禾鄉女性大陸配偶										
受訪者 ^a	省分	來臺時間 ^b	居住豐禾鄉時間	教育	職業	家庭狀態	參與政治	家庭政黨傾向 ^c	身分取得	
淑玲	湖北	21	21	高中	社區	已婚	X	民進黨	V	
依萍	安徽	21	21	大學	漁業	已婚	V	國民黨 ^d	V	
美鳳	內蒙	13	12	高職	餐飲	已婚	V	國民黨	V	
秀儀	福建	20	10	高中	農業	已婚	V	民進黨	V	
怡娟	福建	20	15	大學	社區	頂客	V	國民黨	V	
桂華	廣西	30	6	初中	家管	二婚	V	國民黨	V	
瓊如	海南	10	10	高中	家管	已婚	X	國民黨	X	
魯宜	山東	23	20	初中	餐飲	離異	X	國民黨	V	
澤如	浙江	30	30	大學	旅遊	已婚	X	國民黨	V	
亞惠	海南	26	26	初中	餐飲	已婚	X	X	V	
金忱	天津	19	19	專科	製造	已婚	X	X	V	
敏玲	福建	23	23	中專	金紙行業	已婚	V	X	V	
紫娥	湖北	10	10	高職	創業 ^e	已婚	V	X	V	

註：a 受訪者姓名皆為假名。

b 來臺時間與居住時間皆是以年為單位。

c 意指夫家的政黨傾向。

d 中國國民黨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簡稱國民黨)。

e 意指受訪者將在網路通路販售家鄉小吃。

本研究投入訪談的區域是位在臺灣中部的豐禾鄉，⁸是農、漁並行的重要鄉鎮，目前是以養殖牡蠣、種植水耕蔬菜，以及生產雞蛋為特色。豐禾鄉曾是中部重要的漁港，居民以養蚵捕魚為業。頻繁出海的經驗也讓在地留存豐富的民間信仰，當地的媽祖廟更具規模。然

8 考量到地緣政治的敏感性，本論文將研究區化名為「豐禾鄉」來取代原本鄉鎮的名稱，以保護受訪者個資。

而，隨著產業轉型與港口淤積，豐禾鄉人口外流嚴重。據官方最新統計，該地總人口數已不到35,000人，扶養比更達到47.44%。而該鄉所在的縣市，總人口數約122.5萬人，而女性陸配人數約莫12,000人，是當地重要的族群，備受地方政府重視。官方也通過成立新住民協會、婦女協會等多項社團組織，協助女性陸配融入在地。

由於臺灣多數鄉村具備獨特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農民與農會、農民之間都具有緊密、信賴的社會網絡（廖坤榮 2004；廖淑容 2014）。作為邊陲農漁村的豐禾鄉，在她們生存策略轉型的討論，能補充都市移民人口研究的經驗空缺。另外，也因為農漁村的緊密社會關係，促使陸配能活躍於地方社團以及能與地方官員互動，使得她們在討論地方／國族認同議題上，會有更大的共鳴。這些地方個性（idiographic）都支持豐禾鄉是重要的研究場址有待我們認識。

伍、遷移：「飄洋過海來愛你」之後

遷移至豐禾鄉的女性陸配，主要源自於情感的結合。作為遷移弱勢的她們，即便是前往一個未知的區域，還要面對兩岸環境的差異、父權體制的壓迫，以及身分取得困難等挑戰，陸配仍為愛隻身前往異鄉，努力調適成為「自己人」。

一、為愛妥協：兩岸差異下的生存策略

早期兩岸缺乏交流，公眾多半以負面的社會標籤以狹隘對陸配的認識論。同時，受到媒體的煽動和政策的針對，都使陸配居臺面臨多項困難（朱柔若、劉千嘉 2005；夏曉鵬 2001；陳小紅 2005；楊金發 2006）。從受訪者的生命歷程中，也可看見臺人慣用各種地理名詞來稱呼陸配，諸如「大陸妹」、「大陸的」、「過鹹水的」。這些稱謂背後往往帶有歧視和偏見，讓甫經遷移的陸配難以適從。但是，就如

受訪者淑玲對臺人行為緩頰道：「他就是不知道我的名字。叫我『大陸的』，我也覺得沒有關係。……並不是不尊重我們。」陸配們常以妥協自身的方式來面對根深柢固的刻板印象，是超越了朱柔若、劉千嘉（2005）對陸配進行自我形象整飭（impression management）的三種詮釋，⁹開創了另類的生存策略選擇。

而妥協自身的生存策略可不止於面對稱謂問題，在處理跨域的生存議題同樣管用。來自浙江且擁有大學學歷的澤如屬於第一批遷至豐禾鄉的女性陸配，現今已來臺30年。談到當初遷移動機時，亦這般描述：「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你生活在哪裡，我就必須在哪裡。」因此來臺之初，不僅要遭遇「疏離的外地人」或「低劣的他者」框架下的主觀情感／言語隔離（朱柔若、劉千嘉 2005），還要調適於逆城市移民（counter-urban migration）身分的城鄉落差與語言障礙。

什麼叫心境轉變？就是覺得一下子從大都市到鄉下。因為杭州很熱鬧，（但是）到（豐禾鄉）這邊你找路都不好找，你就知道那個落差。再加上他（按：指丈夫）的言語也不一樣。我婆婆93歲了，她不會講國語，我不會講臺語……隔壁鄰居都是這些長輩，他們幾乎不太會講國語……你要去融入這裡的生活，就要去適應環境。（澤如）

當然，並不是任何的兩岸差異都可以運用妥協自身來適應。余明仁、張訓譯（2018）對移民認同進行討論，發現便利性是「新鄉」形構正向地方感的要素。這種緊密連結生存空間的地方感，在跨域文化差異、臺人情感隔離的夾殺下，深刻打擊了逆城市移民陸配的地方認同。來自泉州，有大學學歷的怡娟對此頗有心得：

9 朱柔若、劉千嘉（2005）延續Goffman認同建構的理論，討論陸配面對汙名化下的認同策略，分別提出陸配會使用「同化」、「正面貢獻」、「歸咎他人」的方式來達到自我形象的整飭。

我到現在還不適應！因為我是都市的小孩。……到這鄉下的時候，各個方面都不方便！……我們在泉州的時候就不會有這個問題，因為在都市什麼方面都很方便。（怡娟）

而來自天津，有專科學歷的金忱也有同樣的經驗：

一定會不適應阿！因為（豐禾鄉）比較偏僻，交通比較不方便。那剛來的話，語言上其實是個很大的障礙。完全聽不懂！然後也沒有朋友、工作。（金忱）

但對於多數陸配而言，兩岸差異並不是成為「自己人」的阻礙。除了採取妥協自身的生存策略外，也會通過地方信仰、餐點製作來調適自身，也從中拓展了社交網絡，都無形地連結了陸配與地方的關聯，展現成為「自己人」的決心。來自湖北的紫娥便奉行這般生存策略：

剛開始來，前面幾年就是不習慣、不適應。……然後（我）接觸到做吃的方面（以後），得到了別人的肯定。開始（把）專注力從家庭移到了自己的身上，或者是移到事業這方面，你的心態就會變得比較平和……對那些瑣碎的小事，就不會那麼地計較了。（紫娥）

二、以「愛」之名：婚配下的父權枷鎖

女性陸配的生命歷程各自不同，遷移的原因也可能伴隨著其他目的性、自身好奇、慕名或為了順利生產。只是在她們遷移的過程中，除了自身情感因素來驅動之外，更可能被傳統父權（家庭）結構的期待所操縱，進而限制女性陸配遷移的選擇。來自內蒙的美鳳就有相關的生命經驗：

我跟我先生是在寧波認識的，之前是打算生完小孩就再回去。不過，因為我們結婚比較晚，我34歲才生我兒子。那後來家裡長輩看又是孫子，想要我們就留下來……就這樣留下來了。（美鳳）

父權支配更可以從她們日常生活中再現，諸如社交關係管制與家庭角色展演。夫家人往往以「自身經驗」與「為了孩子」的角度出發，干涉新住民之間的互動，認為陸配一旦出門，就會被他者帶壞，甚者，還要求她們離家時需要丈夫跟隨。這類情形也被過往的研究（朱柔若、孫碧霞 2010；陳宏 2018；陳芬苓 2014）所論述，能夠發現夫家控制的背後可能交織了臺灣社會男尊女卑、出嫁女性附屬於夫家的父權風氣，以及連結了兩岸對立、國族認同的意識形態。對於一位尚未建立地方網絡關係的異鄉人，無非是疊加上層層枷鎖，使得女性陸配來到豐禾鄉後，更像步入了監禁空間。所在的「家庭」缺乏傳統休憩、安全意義的想像，卻成為與社區／地方隔離的「監獄」（Linda McDowell 2006）。¹⁰

然而，孩子的出世也是陸配在地生活的轉機。不少陸配走進社區的開端便是從各自親屬連帶中發展而來。雖然依舊無法完整逃脫夫家的控制，卻可以透過參與社區來活化（特別是新住民）社會網絡，以及藉由過往妥協自身的生存策略，進而提升對地方的主觀福祉。來自山東且在此居住20年的魯宜回憶起初來豐禾鄉的情景：

小孩有兩、三歲以後，才有（參加）……家政班。……從那時候開始，才知道說，原來我隔壁、鄰居、

10 Linda McDowell (2006, 頁120) 在其著作第三章中的一個子標題為「家是天堂與（或）監獄」，探討女性身處家庭這一私密想像空間時所面臨的壓迫與恐懼。她回顧了女性主義者對家庭結構與男性權力的批判觀點，指認出「家」也可能是一個充滿恐懼與虐待意象的空間，無異於身在監獄。

村莊（有）這麼多好的姊妹，就是從大陸、各個國家嫁來的。那時候就慢慢地認識、接觸她們，就感覺到很快樂，又可以帶孩子，也會參加一些娛樂的活動。（魯宜）

來自湖北也在豐禾鄉生活21年的淑玲，也有類似的經驗：

因為有小孩子嘛！所以就是慢慢地磨合吧！我的感覺差不多兩年，……慢慢地在調節心情。……因為有了小孩子，各方面就開始慢慢地比較習慣。（淑玲）

三、「愛情」的見證：身分取得的挑戰

若是陸配要能順利走進職場，取得更豐沛的社會資本，身分取得將是個門檻。特別針對早期來臺的大陸配偶，由於早期《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的限制，沒有身分即不能工作。¹¹雪上加霜的是，部分陸配遷移後才發現夫家條件複雜。她們除了要實踐傳統家庭勞務的再生產，還需遊走於法律邊緣，負荷經濟收入的任務以維生夫家，否則連往返娘家的路費都負擔不起。¹² Leung et al. (2019) 的研究便指出，華裔女性移民會因為家庭財政困難，選擇同時肩負家庭與事業上的勞作。女性陸配打破了「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實踐，並非起因於自我實踐，而是遭遇惡劣移民生活的無奈之舉。於法規、習俗、家庭的多重排斥下，陸配也衍生出對移入地的失望，顯然

11 依據早期（2008年6月25日）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7-1條：「經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許可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者，得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受僱在臺灣地區工作。應考量臺灣地區就業市場情勢、社會公益及家庭經濟因素……經依前條第三項或第四項規定許可在臺長期居留者，居留期間得在臺灣地區工作。」

12 根據陳小紅（2005）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的整理，民國93年以前陸配來臺資格較為嚴苛，陸配於取得長期居留之前，只能通過「探親」或「團聚」名義來臺。其中，探親停留期限最多只有六個月，也就是最多只有半年能待在臺灣。因此，對於早期的大陸配偶來說，她們需要不斷地往返兩岸，箇中要支付的經費、時間、心力都是極大的挑戰。

更不是透過妥協自身的生存策略所能應付。魯宜與澤如分享她們當初來臺取得身分的困境：

以前那些姊妹真的（等）太久了！拿不到身分證！……生活的關係，你必須要去做（按：指打黑工）！……因為，（陸配）嫁的老公都是年紀大的。然後，就來這邊，你生孩子，你要養孩子、要養家。出去賺錢，要養老公、養公婆。……就是外面再危險，你還是要偷偷去工作。我剛來的那時候，我也會偷偷去工作阿！我來半年就要回去（中國）一次，不去賺錢你怎麼回去？（魯宜）

我覺得太久。我們那個年代結婚要滿八、九年才能夠拿居留證，然後幾乎要到15年的時候才能拿身分證。……最好的青春時間都不能去上班。……我覺得就是不公平！（澤如）

另外，過往身分取得手續的繁冗和需要放棄中國身分／福利，本就讓陸配對臺灣身分取得產生遲疑。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也使得她們衍生出發展下的國族認同。淑玲談起改革開放後經濟轉型後的發展狀況說：「現在大陸這麼好、這麼發達，並不覺得我是大陸人（會）怎麼（了）。」對比起來雜著「偏僻」、「沒有發展」等地理想像的落後豐禾鄉，陸配面臨身分的抉擇更是艱鉅。但受制於家庭倫理與父權結構的干涉，她們仍然為了家庭而放棄自身國籍，朝向備具隔離意象的臺灣求取公民權，似乎也是一種妥協自身的生存策略展演。已經放棄中國身分的美鳳，提到當初放棄中國籍的決定也是備感無奈：

先生說：「你既然已經在（豐禾鄉）這邊了，假如以後我們要有車、房產，我要是大陸那邊的（身分），我也

沒辦法去購買！」所以，我小孩也在這邊，然後我就放棄（中國身分）了，也是為了這個家。（美鳳）

四、遷移：只為人，毋論地

隨著訪談深入，會發現多數陸配對臺灣／豐禾鄉在遷移前的地理想像各有不同。少部分陸配是受到影視、飲食或現代化想像才慕名前來臺灣，但絕大多數的女性陸配與丈夫是透過各種社會網絡的中介才認識，彼此認識的起點多半位在中國，因此對夫家所在的地理環境「沒有概念」更是不下少數。或許陸配藉由過往文本涉略來構築臺灣的地理想像，能零星舉出臺灣的知名地景，但多數陸配的生命歷程就像受訪者紫娥所說：「我剛開始是沒有來臺灣、豐禾鄉看過。……就只是為了一個人，然後單純就過來了。」

如此看來，女性陸配的遷移歷程中，深刻受到愛情驅動而選擇目的地，儼然是婚嫁下的被動配偶（passive spouse），對於她們而言，地方特性是無法成為推／拉力來作用於兩岸人口遷移上，也挑戰了先前遷移研究（Roseman 1983；Rungmanee 2016）移民對目的地社會／自然條件的重視，開創了「只為人，毋論地」的遷移考量。這種未知目的地的遷移配合著複雜的兩岸關係，多數陸配依舊為了家庭而努力抵抗對負面地方感，並透過妥協自身的生存策略，主動建構地方認同。

陸、疫變：多重情感交織下的「新鄉」

先從中國爆發的COVID-19屬於全球性的疫變，儘管臺灣透過各種防疫政策來抵抗病毒入侵，仍出現因病死亡的案例（王善航 2021）。Luo et al.（2023）的研究也指出，面對突發公衛事件，傳輸負面情緒的影響力較大。更何況，疫情下政府的治理措施，更強化了臺灣的民族主義（Yu 2024）。因為陸配來自公認的疫情起源地區，與

近年兩岸關係緊張的因素，她們多被貼上「病毒」甚至是「統戰」的社會標籤。對於想要成為「自己人」的陸配，不僅要直面疫病下的各種情緒，更需全面調整地方／國族認同和生存策略，找尋成為「自己人」的辦法。

一、反中情緒？疫情下的情感政治

疫情作為一件「自然」事件，卻在地緣政治的介入下，成為各個民族國家政治攻防的焦點（Jaworsky and Qiaoan 2021）。Hung and Chang（2023）也以臺灣自身案例，指出Covid-19既可以從生物條件性（biologically conditioned）來解讀，也能用社會建構性（socially constitutive）來認識。在多方因素的交織下，也讓Covid-19的起源更加撲朔迷離。對於女性陸配而言，她們多半相信疫情是自然發生的過程，有的人也相信背後可能混雜著陰謀論與武漢衛生因素，卻都對病毒冠上「武漢」而打抱不平。

（疫情）它每到一定的時間點，一定會有一個大爆發。……現在COVID-19也是，莫名其妙地也就沒有了。……那當然，因為武漢他們市場比較喜歡吃這些野味，那可能也是因為這種原因（才出現疫情）。這原因不是眾說紛爭嘛！什麼陰謀論也有啦。那只能說，因為是這個地方爆發的，就變得「武漢病毒」，對他們確實是不公平啦！（澤如）

Foucault的論述（discourse）是建立真實（truth）的認識論，不僅超越口語和文本形式，也包括了制度、實踐和任意再現方式（Cresswell 2013）。Heimo et al.（2025）提到，各國政府會在疫情期間與他國防疫政策競爭，並透過強化他國災情的論述，證明自身合法的真實性。對於長期處在認同尷尬狀態下的陸配，面對臺人將災病與

地理名詞進行連結的論述，顯然觸動了她們的敏感神經。認定如「武漢肺炎」的敘事口吻，是將疫情與反中情緒掛勾，背後蘊藏著臺灣（政府）的政治操演，更好確立特定政黨的統治地位。對於親身感受到地方籠罩在反中情緒的淑玲與怡娟，也忍不住對當時的情感／國族隔離進行批評。

民進黨就是比較針對我們嘛！（疫情下會反中就是）對我們比較有敵意嘛！說實在地，我是很不願意關心政治的啦！（淑玲）

我就覺得說，（疫情）剛開始，包括鄉下人都會（被）洗腦……「這個疫情都是從你們大陸過來的！你們大陸人才會得這種病毒！」（難道）臺灣人就不不得（COVID-19）嗎？對我來說，就是有個政治因素在裡面！（怡娟）

不僅如此，反中情緒也蔓延至陸配的社會連帶上。疫情期間，陸配子女也可能因母親「敏感」的身分，而在校園生活中遭受到同儕揶揄。雖然多數陸配子女沒有遭受到實質性言語暴力，但是對於他們母親身分的調侃、嘲弄，這些論述都間接驗證了豐禾鄉（民）所建構的情感／國族邊界。依萍就曾經詢問就讀小學的兒子相關問題：

我說：「會不會因為你是陸配的孩子，然後他們（按：指兒子同學）會對你怎麼樣？」（兒子）他說：「不會，可能就是言語上酸一酸結束了，也不會有太多的攻擊這樣子。」（依萍）

然而，也有陸配否認這種過激的論述，認為疫情與反中之間沒有絕對的關聯。秀儀是來自福建的女性陸配，住在豐禾鄉滿十年。雖

然夫家政黨傾向民進黨，但公婆較為開明，並不會因為其中國籍的身分而遭受排斥。秀儀透過長期地方實踐產生強烈的地方認同，進而將正向情感展延於國族認同。當談到時下盛傳的統戰陰謀論時，語氣也略顯無奈，強調疫情只是自然發生的過程，並不是生化兵器。她更從「兩岸一家親」的論述展演自身情感政治，肯認兩岸人民的情感連結，並否定中國會毒殺「同胞」的可能性。這是呼應陳宏（2018）的研究，說明陸配藉由「同文同種」的想像共同體，堅信是「自己人」的事實。

講真的，病毒的東西，其實也不是中國人能控制的。
我們以大陸的人角度（來思考）：兩岸是一家親。（大陸人）不會因為要收復你，就要去害你、殺你，還要用病毒殘害你，大陸人做不出來這種事啦！（秀儀）

當然，就如楊婉瑩、張雅雯（2018）指出，多數陸配來臺前沒有機會也不敢輕易觸碰政治議題。受制於中國思想體制，陸配對政治議題保持高度警覺性，因此在本研究中不願談論這部分的個案也不下數個。就如來臺19年的金忱所說：「這個問題我可以不回答嗎？……其實我對政治不感興趣，我只想把自己生活過好就好了。」透過疫情下的情感政治，陸配透露了對豐禾鄉／臺灣的複雜情感。縱使她們認定臺灣正在有意／無意激化反中情緒，卻強調疫病是自然發生來正名有關中國的論述，並試圖緩和兩岸對立或為自己發聲，都說明了陸配對成為「自己人」的渴求。

二、恐懼地景：備受針對的居臺生活

疫病不只是會從政治層面衝擊陸配的地方／國族認同，也從生活層面影響陸配的身心健康，多少動搖了她們的認同與情感。病毒無差別地入侵，也讓陸配對地方生活感到惶恐不安。化用王志弘、朱政

騏（2007，頁33）對恐懼地景（landscape of fear）的定義：指涉疫情下陸配因為「自我的不完滿或匱缺，以及對陌生事物戒慎」的心理過程，進而察覺、辨識具威脅他者的防衛心理，並展演於空間之中。

林靜蘭等（2021）統整出疫情對臺人心理健康產生嚴重衝擊，此外Ye et al.（2025）的研究更明確指出，人們對疫情與恐懼有顯著關係，恐懼的情感會和染疫的汙名化（stigma）高度相關，甚至對染疫者具有高度歧視性（Zhang et al. 2021）。儘管以統計數據來看，相較群聚較多人口的都市，臨海且人口密度較低的豐禾鄉，所遭受到的整體衝擊較小（疾病管制署 2024）。然而，陸配卻可能從地方上的經驗主義出發，面對國境閉鎖下，與中國親屬的空間隔離；以及親臨周遭親友病歿，卻無能為力的際遇。這些負面的生命歷程都讓壓抑、恐懼和不滿的地方感被放大，感受到嚴重地社會排除。

疫情來的時候，很多大陸姊妹都沒有病房住、沒有病床躺。（醫生）叫你拿藥去家裡面，她（按：其他陸配）就死了。我那時候很恐慌，我家附近那個老闆也死掉。就離我家幾百公尺！……每天都生活在提心吊膽之中，生怕被感染，然後離世了。很可怕的！（瓊如）

整個生活節奏就變得不一樣啦！壓力什麼都會出來。疫情那段時間……父母如果忽然過世，是真的沒辦法回去。（無法）見最後一面這個是最難接受的一點啦！因為距離沒有很遠，但是你就是沒辦法回去！（亞惠）

特別是陸配對中國親屬的思念，更是在自身經歷社會排除後體現。由於中國是全球疫情前期的重災區，陸配藉由轉移居住在豐禾鄉的地方經驗和想像，對故鄉產生恐懼的地方感。淑玲是來自湖北省的武漢人，疫情前有定期返鄉的習慣，至今仍與居住在中國的父母親關係良好。提到COVID-19，她並不是先擔憂自身要面臨的社會排除，

而是強調跨空間尺度的恐懼：「因為我們（武漢）那邊很嚴重……也不能回家。……爸爸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好，我就會擔心。」陸配因為突發事件對異地所產生的恐懼地方感，是跨越物質邊界且多於在地經驗。在相同時間上，挪用現居地空間實踐下的感知經驗，以及社交媒體所再現的地理想像，並綜合過往故鄉的地方記憶，而集合出的複合地方感（complex sense of place）。這是能填補／超越過往地方感研究（林嘉男、許毅璿 2007；Tim Cresswell 2006; Agnew 1987; Hay 1998; Jorgensen and Stedman 2006; C. Y. K. Li et al. 2023）對地方感的模糊論述或個體需要直接接觸的定義，開創新的認識論。

另外，自嘲為「臺灣海峽」的女性陸配，恐懼地方感所帶來的防衛心理，令她們的身分轉型更加困難。受到社會排除和反中情緒作用，使得不少陸配對於中國有關的汙名化格外留心。Zhang et al. (2021) 的研究表明，人們對COVID-19的知識多寡會影響公眾汙名化（public stigma）的程度，其中老人會因為感染風險較大，而對COVID-19患者有更深芥蒂。由於豐禾鄉人口結構受到高齡化影響，村落鄰里的老者眾多。再加上鄉村社會關係較為封閉穩定，更可能出現疫病知識傳播慢、健康自我檢視意識弱的情形（Ji et al. 2022）。因此，無論在日常生活還是工作領域，陸配所遭受到的汙名化不勝枚舉。她們為此感到生氣、委屈，進而主動／被動構築起對豐禾鄉／臺灣的情感隔離。美鳳與瓊如都經歷過病毒帶來的身分汙名化經驗：

很多人會這麼講：「你們（大陸人）自己帶病毒，離你們遠一點。」……那我們心裡面很不舒服！病毒又不是我一個人帶來的，為什麼（是）我回去（大陸）帶回來的？我們肯定是不高興阿！心裡會很委屈。（美鳳）

這是對我們大陸的偏見！……（臺灣人）就不瞭解事情的真相，究竟病毒從哪裡來的，為什麼要（將疫情爆發）扣在我們大陸人身上？這很不公平。（瓊如）

然而，也因為來臺後的地方實踐，能感知到豐禾鄉民友善和樸實的性質，並受制於父權社會下傳統母親角色「以家為重」的定位，為了生活與家庭，女性陸配主動解除恐懼帶來的防衛心理，並藉由去邊界化來穿越中國－臺灣／豐禾鄉雙向的情感隔離，重拾妥協自身的生存策略，通過諒解和解釋來面對汙名化，重建起自己與地方的情感橋梁。另外，她們通過重新檢視自身長期的身分歸屬，拒絕對臺灣國族認同脫鉤。分別來自湖北的淑玲與福建的怡娟也有類似反應：

剛開始看到（疫情被歸咎在大陸上）真的很生氣！要是不生氣，我就不是大陸人了！（只是我也）會覺得說，臺灣人就是像這樣子阿！你叫我們怎麼選擇？這邊也是我們的家，對不對？（淑玲）

可能（疫情）剛開始的時候，……老人家他不知道何謂武漢，他也會都說：「武漢肺炎！都說（病毒是從）你們大陸那邊來的。」那我就會解釋（COVID-19相關知識）。……我不會用說：「你牴觸我！」還是怎樣（激進行為來對待他們）。（怡娟）

除此之外，陸配會在日常生活中主動釋出善意，來強化與地方的連結。諸如疫情期間，她們縱使遭受汙名化而曾與鄰里發生爭執，卻不計前嫌，願意協助確診的獨居老人拿藥。陸配透過採用妥協自身的生存策略，並抱持著「真心待人」的態度進行地方實踐，是能暫時跳脫恐懼地方感，打開「成為自己人」的缺口。在田野經驗中，也可以強烈感受到陸配自發的熱情與善良。就算彼此素未謀面，僅透過地方網絡的關係來認識，我們（研究者）更只是地方的局外人（outsider），但她們卻像是見到多年好友一般，進行談話、互動，顯然是超越了趙彥寧（2006，頁110）沿用Williams（1991）同感認同（vicarious identification）的知識框架，認定陸配會採用「想像他者

如何想像自己以建構自我認同」的地方實踐。陸配藉由疫情中與臺人友善的互動，終破除了負面的刻板印象，積累了連結豐禾鄉的社會資本。深根地方多年的敏玲也感慨道：「現在大家都是誇我的那一種。我就覺得，付出總算有讓人感受到，我覺得很開心。」如此看來，陸配透過地方人士的認同，已逐漸從他者（them）轉變成我群（us），顯然是成為「自己人」最好的應證（Sibley 1995）。

三、愛在瘟疫蔓延時：「家」在疫情下的支持

對於嫁到夫家條件好、公婆明理和經濟獨立的女性陸配，疫情對她們的衝擊較小，「反中」更像是子虛無有的怪譚。Liu et al. (2024) 的研究指出，工作者的性質在疫情期間會與家庭韌性有密切關係。對於本身就是穩定職業的上班族或自產自銷的農漁戶，陸配可能只會反映當下有減班、收入減少的趨勢，疫情並不會影響她們的地方／國族認同，甚至為自己的遭遇感到幸運。從事漁業的依萍，有類似感受：

我們的房子可能沒有那麼密集，（所以）我們（對疫情）的感受、對我們的生活好像沒有太大的影響。（疫情）爆發的時候，我們一樣都有在工作！（依萍）

從事製造業的金忱，也有相似回饋：

其實我還蠻幸運的，至少在疫情期間，還有工作可以做，可以有收入。我們公司附近的一些工廠，都是突然裁員，然後（員工）一下子沒有收入，其實會對一個家庭造成很大的影響。（金忱）

當然，也有部分陸配在疫情期間失去工作，卻因為家庭條件允許、與丈夫感情好、自己又長期有經濟自主能力，反倒覺得疫情是新

生活的轉機。澤如在疫情前主要從事旅遊業，雖然實現女性經濟自主，應具備跳脫父權體制的能動性，得以自在地積累地方的社會資本；卻因長期帶團在中國，對豐禾鄉亦不甚理解。疫情當下，國境邊界閉鎖，臺灣對中國身分的管制更加嚴格（朱凌毅 2020）。作為導遊的澤如，自然失去工作，只能待在家裡，並從家庭緊密地互動產生了地方認同，也呼應了 Ariccio and Theodorou（2024）說明家庭經驗在疫情期間會對地方感產生重要影響。

疫情讓我可以回歸家庭，就沒地方去，失業阿！就在家裡，反而讓家裡面（關係）更好了。疫情對我來說，不算壞事。（因為）好不容易我回來了。當然經濟上面就是不一樣了，你沒有收入經濟就差了嘛！但是，你回過頭來想，全部的家人都在一起了，也還不錯阿。（澤如）

澤如更妥善利用「暫留」地方的機會，在疫情下重新認識地方，並迅速積累社會資本。她也轉以地方社團為發展核心，更在後疫情時代擔任地方社團要務與積極實踐地方參與。就如廖淑容（2014）指出，鄉村社團所創建的強大社會網絡，能緊密地連結在地新住民。澤如通過豐富居臺經驗和綿密地社交網絡來賦權（empower）給外配：藉由傳達官方政令與爭取外配考取證照的機會，使她們能具備一技之長，試圖走出妥協自身以外的生存策略。這種由內向外的主動賦權過程，強化了自身對地方／國族認同，無疑是展演「自己人」的行動，更具備安定地方勢力、潤滑兩岸關係等社會控制的深層意涵。

張筵儀（2017）曾探討新住民與臺灣基層治理之間的關聯，認為臺灣地方治理會涉及基層治理和社區治理，具備影響地方發展的力量。然而，新住民因為家庭、經濟因素，造成他們基層治理參與度普遍不足。但豐禾鄉顯然是另一番景象：在現任鄉長、縣長等地方官員支持下，成立的地方社團眾多且彼此關係緊密。不少陸配更是將地方

社團作為拓展社會網絡的起點，積極參與地方實踐。同時，逐漸以地方社團為核心，對豐禾鄉形構出「家」的地方感。瓊如也從參與地方社團的經驗中，給予正向的回饋：「搞這個新住民活動……對我們在異鄉就能體會到一種家鄉的感覺。是不錯，有一種親切感。」

雖然疫情期間居家政策的規定與自我隔離的意識，使得各社團活動銳減，她們卻改以線上的形式，交換彼此資訊，延續「家」的地方感。這種跨越傳統親族（kinship）、實體空間的家庭想像，不僅再現出陸配對豐禾鄉的複合地方感，也從中達成基層治理的自治行動，並有效鬆弛時下緊繃的醫療量能，實踐「自己人」的情感政治，強化地方／國族認同。平日積極參與社團的依萍，也分享疫情期間在地方的互助經驗：

有姐妹確診了，但是她兩個孩（子）都在外地讀書。……然後她就聯繫到我說：「家裡沒有藥。」我說：「那我剛好有（藥）。或者你要哪一種藥，我去幫你買。」買完之後，就吊在她家門口。……因為協會，讓我認識到很多的姐妹，也剛好我可以協助她，我也很開心。
（依萍）

如此看來，豐禾鄉雖然是處在物質與想像邊陲的地理空間，陸配可能會因政治與經驗，主動／被動產生恐懼地方感，更因此與在地人產生情感隔離。卻也因為自身地方經驗、自我妥協和真心待人的多重生存策略交織，主動去邊界化，朝向成為「自己人」而努力。另外，因為鄉村地區暴露的風險小且地方社團活躍，能透過各種正向情感來修補、減輕疫情下的衝擊。對於陸配而言，豐禾鄉是疫情避風港或緩衝帶，是值得棲居（dwelling）的所在，側向證明了她們存在地方的歸屬與幸福（王應棠 2009）。更透過彼此互動中，找尋適當的生存策略，展演成為「自己人」的情感政治，正向提升對臺灣的國族認同。

柒、新生：要成為「自己人」

隨著2023年5月COVID-19防疫等級降階，臺灣也正式步入後疫情時代（疾病管制署 2023）。各項規定逐漸鬆綁，也讓不少關在家中的陸配，感到脫離牢籠，重獲新生的地方感。陸配也通過疫情重新檢視自身與地方連結，尋找是「自己人」的證明。

一、健康認同：恐懼地景的延伸

陸配疫情期間經歷了親友鄰里死亡和隔離，深刻衝擊著自身的健康與公衛意識。Read et al. (2022) 便指出，COVID-19封城能影響著人們對感染預防措施的認知；疫情對於民眾健康認知的升級，甚至能反饋於消費市場的選擇上 (Xu et al. 2022)。陸配除了強化個人／家庭的衛生意識，飲食健康也成了她們關注的方向。這些對於疫病警戒的地方實踐，說明著她們仍存活於疫情的恐懼地景之中。依萍與秀儀分享她們在後疫情時代對健康與衛生更加關注的想法：

因為我一直是素食者，我吃素也吃十幾年了，可能周邊的人都已經確診，我們還沒（確診）。所以我覺得（疫情後）飲食還蠻重要的。我一直是吃素食，可能免疫力相對地還不錯。（依萍）

現在出門防疫做好一點。儘量不要把不好的細菌（帶回家）……會有（公衛）那方面的意識在。（現在）去到醫院，我們回來是（會）換衣服，變成自主地去防疫、去消毒。（秀儀）

除此之外，疫情期間對醫療資源的使用，也影響著後疫情陸配對地方的認同。不少研究 (Marques et al. 2024; Phongprecha et al. 2024;

Russell et al. 2023) 皆指出，疫情下人們亟需健保 (health care) 的支持，也呼籲各地政府、機構對公衛安全的重視。儘管豐禾鄉的醫療資源相對稀缺，陸配卻可以通過載具前往鄰近市鎮就診。對於她們而言，由於當下並未封城，交通的易達性不是主要考量；臺灣整體健全的健保制度卻尤為重要，不僅診治費用便宜、醫療體系便利，住院還不用押金，是勝過中國的醫保制度，進而產生了臺灣的國族認同，是她們成為「自己人」的重要信念。

臺灣的健保很好！我們其實拿了身分證就不想回去（中國）了！……很多大陸姐妹家人過來（都說）：「你們的醫保（按：指臺灣健保）真好！」有健保去看醫師好方便喔！像我們（中國）那邊就不行，你一定要有押金才能去住院。沒有押金你就住不了院，就等死。大陸姊妹很多（都說）：「臺灣（健保）這點很人性化！」（美鳳）

二、全面轉型：後疫情的安生

Lin (2023) 以「寂寞的流行病」(loneliness epidemic) 來稱呼 COVID-19，發現孤獨感與疫情爆發有高度關係，特別是女性、社交網絡有限且工作不穩定者將面臨更大孤獨風險。顯然陸配也是情感生活的重災區，因此她們格外珍惜著後疫情時代豐禾鄉自由和安全的安生地方感，也轉變成了她們的生存策略，從「妥協自身」轉變成「隨遇而安」。魯宜與紫娥分享疫情後重獲經濟自主的感受：

我感覺那個心情就是不一樣，你被關很久，就被突然放出來。你就很記得那種感覺！你（可以）做任何事情，我想說：「終於我可以去工作了！就算生意很少，人家外帶也好，至少我有經濟上來源。」有錢（賺）……就有

辦法，不會擔心到完全很無助的那種（感覺）。就很自由吧！（魯宜）

就珍惜現在的生活吧，願好當下就好。現在就是想要做什麼，就馬上去做。然後想要買什麼，只要在允許的範圍之內就可以。沒有像之前那樣子說，一定要怎樣怎樣。（紫娥）

後疫情各項生活機能回歸，讓多數陸配對現今地方生活感到知足、滿意，也從互動中標記豐禾鄉（民）為友善、樸實的社會標籤。雖然仍會偶遇連結疫情－反中的極端反應，但多數陸配對於汙名化已然看淡，以不接觸、不理會、早習慣來面對，側向體現出她們隨遇而安的生存策略轉變。從事餐飲業的魯宜，便從工作經驗來分享心態的變化：

之前是有被同事說：「（疫情）都你們大陸人害的！」我說：「我沒那個能力啦！」大陸做什麼、臺灣做什麼，不是你是哪一國出生的，你就是誰做決定的。還是比較友善的（臺灣人）比較多啦！真的要習慣（別人對中國身分的看法）。（魯宜）

抱持著隨遇而安的她們，認為後疫情時代是新生的開始，堅信自己具備穩當的家庭韌性，足以度過疫情時的難關。面對驟變的產經環境，些許陸配視危機為轉機，趁機調轉工作方向。但是對於遷移至豐禾鄉許久的女性陸配，卻不認為一場疫變足以摧毀個人生計。她們從生命歷程出發，回憶起自己如何白手起家，並突破地方的情感／身分隔離，與家人構建屬於自己的「家」以扎根於豐禾鄉。這種在地家庭韌性（place-based family resilience）源自於陸配個體先前對地方的感知、記憶和想像，是認識於經驗主義，並從疫情中再現與抵抗的過

程。既可以牢固陸配對地方的主觀福祉，甚至能在疫情後昇華為地方／國族認同。這能補充過往討論疫情下家庭韌性研究當中（Chen and Yeung 2024; Gayatri and Irawaty 2022; R. Li et al. 2025; Ramadhana 2020; Tsibidaki 2021; Walsh 2020）所未能強調「地方主動建構家庭韌性」的闕漏。¹³

三、我們就是「自己人」：陸配情感政治展演

地方社團在後疫情時代交流回歸實體互動，活動也逐漸復甦，也重新連結陸配的社會網絡。只是對於疫情前活躍於社團的陸配，疫情帶來的線上社交也讓她們感到情感疏離，衝擊「家」的地方感建構。擔任新住民協會幹部的美鳳也提到：「大概三年（沒有實體互動），大家（情感）一定就是疏遠了，……現在很少去聚在一起。」所幸，地方社團仍透過現任鄉長的動員，透過社區活動來（再）生產「家」的地方感，讓陸配有要成為「自己人」的動力。秀儀作為來臺20年的陸配，更會以過來人的身分引領他者共構「家」的地方感，交織出獨特的社會網絡。

解封之後，社區有蠻多的（活動）。鄉長（舉）辦活動、協會（舉辦活動）……（我）一直都有去參與。……因為我們想帶（著）姊妹，融入這個大家（庭）。（秀儀）

13 關於過往疫情下家庭韌性的討論，會取決於眾多脆弱性因素，諸如年齡、教育程度、經濟程度、心理狀態等方面（Gayatri and Irawaty 2022; R. Li et al. 2025; Tsibidaki 2021）。另外，也可能集中在人際關係、生活意義、家庭時間、鄰里關係、政府和社區支持等因素，都是建構家庭韌性的條件（Chen and Yeung 2024; Ramadhana 2020; Tsibidaki 2021; Walsh 2020）。其中，Walsh（2020）的研究有特別點出社區（communities）對家庭韌性的重要性，說明疫情當下／之後人與社區的互動過程。像是建立社交圈（social pods）來安全聚會，以提升家庭韌性。然而，「在地家庭韌性」則是強調陸配長久以來（疫情前）在地方實踐中，所獲取的個人主觀地方連結，是透過物質／非物質的「家」所產生的地方感／地方認同。在空間尺度的界定與因果關聯的推導上，應是有別於Walsh（2020）的社區—家庭韌性。

其中，鄉長更是地方的「大家長」，是陸配社會網絡的核心。對於女性陸配而言，鄉長除了是自己能直接互動的高階官員，更能通過選舉、評議來參與豐禾鄉／臺灣政治系統的運作，是彰顯國族認同的最佳時機（Easton 1965）。她們可以透過展演情感政治來影響價值權威分配者，以往被認定是不易見於中國政治體系的行動（趙建民 2023）。因此，陸配對鄉長的施政和關心會加以重視。從她們對鄉長的正向評價中，展演自身的地方／國族認同，正呼應了過往研究（朱柔若、孫碧霞 2010；朱柔若、劉千嘉 2005；陳宏 2018；楊婉瑩、李品蓉 2009；楊婉瑩、張雅雯 2018；趙彥寧 2006）指出陸配對身分接納的渴望。夫家政治傾向於國民黨，並且在鄉長選舉時參與動員的依萍描述：

我們協會是鄉長協助成立的。一個非常有愛的一個大家長，然後她給予大家的能量，其實是不分藍、綠。她只是想做好她當下分內的工作，我覺得這一點是真的值得去學習。（依萍）

陸配在政治結構的能動性也能體現於國策議論。地方政治體系成功參與的經歷，陸配更會將臺灣情感依附於自身相干的政治議題（楊婉瑩、張雅雯 2018）。像她們對於祖國論、李秀貞案等時事皆有批評，也展演自身情感政治，表達中國國族認同。

我看過那個影片（按：指祖國論），（賴清德）他的說法根本是錯誤的。說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我們的祖國，他就不應該那樣說。他就一直在挑釁大陸！……我覺得大陸是用這種的方式（按：指軍演）在保護祖國的領土。它是怕臺灣被美國搶占了，獨立出去了。（瓊如）

我覺得民進黨完全是針對中國的政策。之前在選舉，民眾黨有推薦一個中國籍的新娘當作不分區立委。那時候（民進黨）也是在打壓她，結果後來她就自動退出。那現在又有中國籍（陸配可能擔任立委），（民進黨）他們就是不講道理地（打壓她）……我覺得這是無理取鬧。（敏玲）

不僅如此，對於近期國、眾兩黨提出的外配身分證取得修法（邱子綾 2025），多數陸配會優先通過自身經驗來解釋，認為身分取得差異源於民進黨對陸配的歧視。這些論述都展現陸配認為要成為「自己人」的困難，以及處在兩岸中介狀態的無奈。投身基層治理的怡娟與澤如，也批評政策的針對性：

（身分證取得年限差異）本來就是政治問題，不是國家認同問題。……其他國家為什麼是4年？為什麼大陸的就是6年？你就是逢中必反！因反對而反對，不是因為什麼！（怡娟）

重點是（民進黨）他們怕我們全部的人過來，臺灣人就沒有機會了。因為我們很勤奮，我們很肯吃苦，我們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剛嫁來）那時候，（民進黨）對我們的歧視是：「我們來臺灣，是要把自己的錢騙回去的！」（澤如）

當然，並不是陸配都如此極端。紫娥是近年才拿到身分證的「新」臺灣人，就認為身分證取得年限差異並不影響自己成為國家公民的權益。除了是自身對政治冷漠外，更是隨遇而安的生存策略展演。

不管別的國家，這個（身分證取得）政策對別的國家多麼友好……那多兩年而已，我是覺得無所謂啦！你如果是真心實意想要過日子、想要拿這個身分證，多這兩年、不多這兩年，其實是沒有差異的。（紫娥）

但無論是對國策批評／讚賞，都是陸配情感政治的再現，也可以發現她們似乎將政治和國家分開來看：評議的對象多半針對特定政黨，卻不否認後疫情時代對豐禾鄉／臺灣的認同，她們更透過生存策略全面轉變和情感政治展演來「重獲新生」。而國族認同更是從地方認同出發，是依附於地方經驗之上，透過參與基層治理和點評國策議論，得以彰顯是「自己人」。儘管陸配仍脫離不了疫病所形塑的恐懼地景，但「家」的地方感卻成為一種抵抗的力量，由下而上支撐著她們生存於地方。通過各方面的地方實踐，都證明了陸配已然是「自己人」的事實。

捌、結論

本研究透過地方理論檢視豐禾鄉女性陸配的生命歷程，分別從來臺後、疫情下到後疫情三個時段來探討她們的地方感、地方／國族認同流變，和對應的生存策略轉變。面對長期的社會排除與父權結構干涉，陸配多呈現負面的地方感，仍採用「妥協自身」的生存策略以符應於「臺灣人母親」或「臺灣媳婦」的身分想像。但到了後疫情時代，陸配轉而改用「隨遇而安」的生存策略來面對日漸複雜的國族認同和身分交織。對於經歷生死、隔離的陸配，汙名化和社會排除儼然不再是關切重點。健康注視和家庭連結反而是自身形構地方感的要素，地方認同也從中再生產了「自己歸屬於此」的本體論基礎；或延伸至國族認同的形塑，成為是臺灣人的身分想像。經歷COVID-19的重大疫病，健保制度的優勢得以展現，也讓陸配產生了正向的國族

認同以及地方感，在多重情感交織下形構「自己是臺灣一分子」的論述。

對於疫情與反中的關聯，陸配看法歧異：認為二者有關聯的陸配，強調疫情連結中國的汙名化是政治操作下的結果，並點名民進黨對她們長久以來的身分隔離；認為二者無關聯的陸配，強調疫情是自然發生的事實，試圖緩和兩岸對立，但也反對疫情的汙名化。也有陸配是在訪談前便表明拒答政治相關的議題。儘管這些批評或讚賞衝擊著陸配的地方／國族認同，卻因為她們對國家／政治認知的壁壘分明，反而並不影響「國家」的定位，呈現獨特的認同解釋。而且，與地方官員直接互動、和社團緊密連結的地方實踐經驗，都讓陸配產生主觀福祉和「家」的地方感，更加牢固「自己是臺灣一分子」的認知。

由此看來，多數陸配能通過地方實踐來說服或證明自己是臺灣人，儘管身分取得相對困難，她們仍以各種生存策略面對不斷革新的兩岸關係。縱使少數陸配因為負面的地方經驗而不認同「自己是臺灣一分子」，卻因為存在著各種地方的社會連帶，以及長期以來自身的地方實踐和情感政治展演，都用行動再現了「自己是臺灣一分子」的事實。突破了過往是由我群向他者的認定，或是透過個體是否具備公民權的認識論，開創了新的「臺灣人」解釋。

最後，本研究透過田野和訪談的方式，發現後疫情時代陸配對兩岸復航／直航的重視，以及身分平等與兩岸和平的期望。陸配來臺後便遭受各種社會排除，疫情期間更是因為汙名化而與臺人建立了情感／身分邊界。COVID-19造成了自身和中國親屬多年的空間隔離，進一步加深她們對返鄉探親的渴望。隨著兩岸關係緊張，陸配也期待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對立，希望能提出不同於現況的兩岸互動解方。對此，本研究也呼籲政府應重視陸配兩岸通勤的權益，包含適當推動加開兩岸航班的班次與恢復先前直飛城市的航班通勤等措施。同時，政府亦應重視身分取得法規的平等原則，期待能以和平的方式處理當前

的兩岸關係，消除新住民成為「自己人」的制度性阻礙，使她們能在臺灣社會中有更穩定且尊嚴的生活條件。

謝誌

本研究曾獲國科會113年度大專生計畫（編號：113-2813-C-018-028-H）經費支持，並發表於2025中華民國地理學會年會暨第29屆臺灣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聯合會。特別感謝新住民協會理事長在受訪者引薦和在地田野協助，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助理教授朱凌毅的研究建議，以及三位匿名審查委員的寶貴建議；另致謝韓宇翔及LTSER彰化站各位夥伴在通勤與技術上的幫忙。

參考文獻

- 王志弘、朱政騏（2007）風險地理、恐懼地景與病理化他者臺灣 SARS治理之空間／權力分析。中國地理學會會刊，38: 23-43。
doi:10.29972/BGSC.200703.0002
- 王善航（2021）新冠疫情下的韓國臺灣防疫政策比較。發展與前瞻學報，31: 55-76。doi:10.6737/JDP.202103_(31).04
- 王應棠（2009）棲居與空間海德格空間思維的轉折。地理學報，55: 25-42。doi:10.6161/jgs.2009.55.02
- 內政部移民署（2025）外籍配偶人數與大陸一含港澳一配偶人數按證件分。<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5/7344/7350/8887/?alias=settledown>（取用日期：2025年3月13日）。
- 中華民國數位發展部（2024）新住民歸化國籍流程—外籍配偶及高級專業人才。我的E政府。https://www.gov.tw/News_Content_26_642841（取用日期：2025年5月10日。）
- 朱柔若、孫碧霞（2010）印尼與大陸配偶在台社會排除經驗之研究。教育與社會研究，20: 1-52。doi:10.6429/FES.201006.0001
- 朱柔若、劉千嘉（2005）大陸新娘在臺灣的認同問題探討。社區發展季刊，112: 179-196。
- 朱凌毅（2020）無用的兩岸關係。熱風學術，17: 177-180。
- 余明仁、張訓譯（2018）從異鄉到新鄉：外地人的地方認同之研究。育達科大學報，46: 55-72。
- 宋郁玲、姜蘭虹（2008）從城市「中心」到「邊緣」的「上海人」：上海市中心區拆遷戶棲居歷程之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0: 165-212。doi:10.29816/TARQSS.200806.0005
- 宋郁玲、陳金永（2017）北京城市新移民的空間流動與社會流動：「去」與「留」之間。人口學刊，55: 39-97。doi: 10.6191/JPS.2017.55.02

- 邱子綾（2025）藍委提案中配取得身分證時間縮短為4年與其他外籍配偶規定有何不同？<https://news.pts.org.tw/article/733781>（取用日期：2025年3月12日）。
- 林嘉男、許毅璿（2007）人與環境關係之論述：釐清「地方感」、「地方依附」與「社區依附」在環境研究上的角色。環境教育研究，5(1): 41-71。doi:10.6555/JEER.5.1.041
- 林靜蘭、高瑞勇、丘梅萱、涂兆璘（2021）疫情下民眾的心理健康。精神衛生護理雜誌，16(2): 14-21。doi:10.6847/TJPMHN.202109_16(2).02
- 疾病管制署（2020）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疾病介紹。<https://www.cdc.gov.tw/Category/Page/vleOMKqwuEbIMgqaTeXG8A>（取用日期：2023年10月5日）。
- 疾病管制署（2023）2023年5月1日起防疫降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調整為第四類傳染病，指揮中心同日解編，由衛福部主政繼續整備應變工作。<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W65sFwVgfn8ak3VVoh57Q?typeid=9>（取用日期：2025年3月11日）。
- 疾病管制署（2024）地區年齡性別統計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依發病日統計（以週為單位）。<https://data.gov.tw/dataset/118038>（取用日期：2025年3月8日）。
- 高淑清（2008）質性研究的18堂課——首航初探之旅。高雄：麗文文化。
- 夏曉鵬（2001）「外籍新娘」現象之媒體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3: 153-196。doi:10.29816/TARQSS.200109.0008
- 陳小紅（2005）跨國婚姻中人權問題之探討：來台生活「大陸配偶」案例之檢視。國家政策季刊，4(1): 141-164。doi:10.6407/NPQ.200503.0141
- 陳宏（2018）如夢似魘的遷徙：在臺陸籍配偶的認同實踐研究。傳播

- 研究與實踐，8(2): 151-186。doi:10.6123/JCRP.2018.07_8(2).0005
- 陳志柔、吳家裕（2017）臺灣民眾對外籍配偶移民的態度：十年間的變化趨勢（2004-2014）。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9(3): 415-452。
- 陳芬苓（2014）女性新移民生活狀況的轉變與政策意涵。東吳社會工作學報，27: 29-59。
- 陳蒨（2016）香港金紫荊廣場：身分認同爭議。文化研究，23: 165-186。doi:10.6752/jcs.201609_(23).0009
- 張華蓀（2005）蝸行20年：女性主義地理學在臺灣的發展。地理學報，42: 25-46。
- 張筵儀（2017）臺灣基層治理之制度設計與能力型塑：兼論新住民在村里、社區發展協會與公民審議會議的角色。中國行政評論，23(2): 134-167。doi:10.6635/cpar.2017.23(2).05
- 陸委會（2000）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國八十九年年報。<https://www.mac.gov.tw/cp.aspx?n=56E943FDF2185B64&s=5A71A717308A56D8>（取用日期：2025年4月28日。）
- 陸委會（2007）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國九十六年年報。<https://ws.mac.gov.tw/001/Upload/OldFile/public/data/962411103471.pdf>（取用日期：2025年4月28日）。
- 陸委會（2023）關於大陸配偶參選及擔任公職相關規定之說明。https://www.mac.gov.tw/News_Content.aspx?n=B383123AEADAEE52&s=2A58141665DF5727（取用日期：2023年11月28日）。
- 黃宗儀（2020）中港新感覺：發展夢裡的情感政治。臺北：聯經。
- 黃宗儀、胡俊佳（2020）從觀光客到港妻：臺港跨境婚姻中的親密性與生活方式想像。文化研究，32: 169-210。doi:10.6752/JCS.202104_(32).0007
- 楊金發（2006）嘉義地區大陸配偶之研究：權力機制及其可能。政策研究學報，6: 305-335。

- 楊婉瑩、李品蓉（2009）大陸配偶的公民權困境——國族與父權的共謀。臺灣民主季刊，6(3): 47-86。doi:10.6448/TDQ.200909.0047
- 楊婉瑩、張雅雯（2018）參與之後？大陸配偶之政治行動與認同。臺灣民主季刊，15(2): 1-50。
- 葉韻翠（2021）民國的來向與歸往：國史館總統副總統文物展中的國族地方感。地理學報，98: 17-43。doi:10.6161/jgs.202104_(98).0002
- 廖坤榮（2004）台灣農會的社會資本形成與政策績效。政治科學論叢，22: 181-220。
- 廖淑容（2014）台灣鄉村地區發展的社會資本評量：八個鄉鎮比較研究。建築與規劃學報，15(2&3): 175-192。
- 趙建民主編（2023）大陸研究與兩岸關係（五版）。新北：晶典文化。
- 趙彥寧（2006）情感政治與另類正義：在台大陸配偶的社會運動經驗。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16: 87-152。doi:10.6523/168451532006030016003
- 監察院（2021）COVID-19新冠肺炎期間滯留中國小明、小紅入境管制措施及權益調查案監察院促請行政院依聯合國指引、兩公約及兒童人權公約等相關規範通盤檢討，以增益我國政府人權保護形象。https://www.cy.gov.tw/News_Content.aspx?n=125&s=20026（取用日期：2025年4月30日）。
-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華總一義字第09700110991號令（2008年6月25日）。
- 總統府（2021）共識化分歧 團結守臺灣 總統發表國慶演說。<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6253>（取用日期：2023年10月18日）。
- 顏亮一（2006）國族認同的時空想像：台灣歷史保存概念之形成與轉化。規劃學報，33: 91-106。doi:10.6404/JP.200612.0091

- 羅鼎鈞 (2022) 新冠疫情下兩岸婚姻融合困境之研究。發展與前瞻學報, 35: 85-104。doi:10.6737/JDP.202203_(35).05
- Linda McDowell (2006) 徐苔玲、王志弘譯, 性別、認同與地方: 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臺北: 群學。
- Tim Cresswell (2006) 徐苔玲、王志弘譯, 地方: 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 群學。
- W. Lawrence Neuman (2014) 王佳煌、潘中道、蘇文賢、江吟梓譯, 當代社會研究法: 質化與量化取向 (第二版)。臺北: 富學文化。
- Agnew, J. A. 1987. *Place and Politics: The Geographical Media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 London, UK: Routledge. doi:10.4324/9781315756585
- Agnew, J. A. 2002. *Place and Politics in Modern Ital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 Anderson, B.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NY: Verso.
- Ariccio, S. and A. Theodorou. 2024. “Stay at Home Behavior During COVID-19: The Role of Person-Hom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97: 102334. doi:10.1016/j.jenvp.2024.102334
- Bricker, K. S. and D. L. Kerstetter. 2000. “Level of Specialization and Place Attachment: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Whitewater Recreationists.” *Leisure Sciences* 22(4): 233-257. doi:10.1080/01490409950202285
- Casey, E. S. 1987. *Remembering: A Phenomenological Study*.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Chakraborty, A. and S. Bose. 2020. “Around the World in 60 Days: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Impact of COVID-19 on Online Global News Sentiment.”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3: 367-400. doi:10.1007/s42001-020-00088-3
- Chen, X. and W.-J. J. Yeung. 2024. “COVID-19 Experiences and Family Resilience: A Latent Class Analysi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 87(1): 280-299. doi:10.1111/jomf.13031
- Cresswell, T. 2013. *Geographic Though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UK: Wiley-Blackwell.
- Davidson, J. and C. Milligan. 2004. "Embodying Emotion Sensing Space: Introducing Emotional Geographies."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5(4): 523-532. doi:10.1080/1464936042000317677
- Doroszuk, M., M. Kupis, and A. Z. Czarna. 2019. "Personality and friendships." Pp.1-9 in *Encyclopedia of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edited by V. Zeigler-Hill and T. K. Shackelford. Cham: Springer. doi:10.1007/978-3-319-28099-8_712-1
- Easton, D. 1965.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Gayatri, M. and D. K. Irawaty. 2022. "Family Resilience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A Literature Review." *The Family Journal* 30(2): 132-138. doi:10.1177/10664807211023875
- Hay, R. 1998. "Sense of Place in Developmental Contex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8(1): 5-29. doi:10.1006/jevp.1997.0060
- Heimo, L., P. Alasuutari, L. P. Ferrer, and O. Ulybina. 2025. "Evoking 'Other Countries' in Media Discourses: The Cas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Six Countries." *Discourse, Context & Media* 63: 100847. doi:10.1016/j.dcm.2024.100847
- Hung, S.-C. and S.-C. Chang. 2023. "Framing the Virus: The Political, Economic, Biomedical and Social Understandings of the COVID-19 in Taiwan."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188: 122276. doi:10.1016/j.techfore.2022.122276
- Jaworsky, B. N. and R. Qiaoan. 2021. "The Politics of Blaming: The Narrative Battl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Over COVID-19."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6(2): 295-315. doi:10.1007/s11366-020-

09690-8

- Ji, W., W. Shi, X. Li, J. Xi, J. Zhong, and F. Qi. 2022. "Establishment of Primary Health Information in the COVID-19 Outbreak: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Population Awareness of Self-Testing." *Informatics in Medicine Unlocked* 31: 100981. doi:10.1016/j.imu.2022.100981
- Jorgensen, B. S. and R. C. Stedman. 2006.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redictors of Sense of Place Dimensions: Attachment to, Dependence on,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Lakeshore Properti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79(3): 316-327. doi:10.1016/j.jenvman.2005.08.003
- Leung, V. W. Y., Y. Zhu, H.-Y. Peng, and A. K. T. Tsang. 2019. "Chinese Immigrant Mothers Negotiating Family and Career: Intersectionality and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49(3): 742-761. doi:10.1093/bjsw/bcy081
- Li, C. Y. K., L. C. J. Leung, M. K. Ng, W. Y. C. Leung, T. C. A. Yeung, C. H. A. Cheng, ... and M.-P. Kwan. 2023. "Sense of Place,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the Influence of Housing and Neighbourhoo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Marginalised Districts in Hong Kong." *Wellbeing, Space and Society* 4: 100153. doi:10.1016/j.wss.2023.100153
- Li, R., D. Wu, L. Zhu, T. Mi, S. Jia, and Z. Ren. 2025.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amily Resilience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 Three-Level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7: 13591053241311572. doi:10.1177/13591053241311572
- Lin, S. L. 2023. "The 'Loneliness Epidemic', Intersecting Risk Factors and Relations to Mental Health Help-Seeking: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During COVID-19 Lockdown in Canada."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320: 7-17. doi:10.1016/j.jad.2022.08.131

- Liu, Y., T. Sun, J. Yao, Y. Wang, H. Yang, and T. Dai. 2024. "Did COVID-19 Discriminate in the Global South? Revealing Heterogeneity of Urban Households' Livelihood Resilience Based on Evidence From Bangladesh, China, India and Philippines." *Journal of Urban Management* 13(4): 694-704. doi:10.1016/j.jum.2024.07.007
- Lukermann, F. 1964. "Geography as a Formal Intellectual Discipline and the Way in Which it Contributes to Human Knowledge." *Canadian Geographer* 8(4): 167-172. doi:10.1111/j.1541-0064.1964.tb00605.x
- Luo, H., X. Meng, Y. Zhao, and M. Cai. 2023.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Sentiment on Multi-Dimensional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Using COVID-19 Data in China."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44: 107733. doi:10.1016/j.chb.2023.107733
- Lyu, Z. and H. Takikawa. 2022. "Media Framing and Expression of Anti-China Sentiment in COVID-19-Related News Discourse: An Analysis Using Deep Learning Methods." *Heliyon* 8(8): e10419. doi:10.1016/j.heliyon.2022.e10419
- Marques, F. R. D. M., C. Laranjeira, L. Carreira, A. M. Gallo, W. C. Baccon, M. Paiano, ... and M. A. Salci. 2024. "Illness Experiences of Brazilian People Who Were Hospitalized Due to COVID-19 and Faced Long COVID Repercussions in Their Daily Life: A 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 Study." *Behavioral Sciences* 14(1): 14. doi:10.3390/bs14010014
- Mazumdar, S., S. Mazumdar, F. Docuyan, and C. M. McLaughlin. 2000. "Creating a Sense of Place: The Vietnamese-Americans and Little Saig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4): 319-333. doi:10.1006/jev.2000.0170
- Moore, R. L. and A. R. Graefe. 1994. "Attachments to Recreation Settings: The Case of Rail-Trail Users." *Leisure Sciences* 16(1): 17-31.

doi:10.1080/01490409409513214

- Ottenheimer, D., Z. Huda, E. T. Yim, and H. G. Atkinson. 2022. "Physician Complicity in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voluntary Sterilization among Women from Mexico and Central America Seeking Asylum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Forensic and Legal Medicine* 89: 102358. doi:10.1016/j.jflm.2022.102358
- Phongpreecha, T., E. Berson, L. Xue, S. Shome, G. Saarunya, J. Fralick, ... and A. Kerr. 2024. "Intra- and Post-Pandemic Impact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on Stanford Health Care." *Academic Pathology* 11(2): 100113. doi:10.1016/j.acpath.2024.100113
- Porter, G., E. Murphy, F. Adamu, P. B. Dayil, A. De Lannoy, S. Han, ... and K. Van der Weidje. 2021. "Women's Mobility and Transport in the Peripheries of Three African Cities: Reflecting on Early Impacts of COVID-19." *Transport Policy* 110: 181-190. doi:10.1016/j.tranpol.2021.05.025
- Proshansky, H. M. 1978. "The City and Self-Identity."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0(2): 147-169. doi:10.1177/0013916578102002
- Ramadhana, M. R. 2020. "A Dataset for Emotional Reactions and Family Resilience During COVID-19 Isolation Period among Indonesian Families." *Data in Brief* 31: 105946. doi:10.1016/j.dib.2020.105946
- Read, B., C. A. M. McNulty, N. Q. Verlander, N. Moss, and D. M. Lecky. 2022. "Comparing Public Knowledge Around Value of Hand and Respiratory Hygiene, Vaccination, and Pre- and Post-National COVID-19 Lockdown in England." *Public Health* 22: 76-83. doi:10.1016/j.puhe.2022.08.015
- Relph, E. 2008.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Rose, G. 1995. "Place and Identity: A Sense of Place." Pp. 87-132 in *A Place in the World? —Places, Cultures and Globalization*, edited by D. Massey and P. Jess. Oxford, UK: The Open University.
- Rose, G. and M. Ogborn. 1988. "Feminism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14(4): 405-409. doi:10.1016/S0305-7488(88)80040-9
- Roseman, C. C. 1983. "A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Migration Destination Selection."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6(3): 151-165. doi:10.1007/BF01258957
- Rungmanee, S. 2016. "Unravelling the Dynamics of Border Crossing and Rural-to-Rural-to-Urban Mobility in the Northeastern Thai-Lao Borderlands."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2(7): 693-704. doi:10.1002/psp.1989
- Russell, D., J. G. Burgdorf, K. T. Washington, J. Schmitz, and K. H. Bowles. 2023. "'Second Set of Eyes': Family Caregivers and Post-Acute Home Health Car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109: 107627. doi:10.1016/j.pec.2023.107627
- Shankar, I. and H. Northcott. 2009. "Through My Son: Immigrant Women Bargain with Patriarchy."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32(6): 424-434. doi:10.1016/j.wsif.2009.09.004
- Sibley, D. 1995. *Geographies of Exclusion: Society and Difference in the West*. London, UK: Routledge.
- Starkey, P., Z. Batool, E. M. W. Younis, A. U. Rehman, and M. S. Ali. 2021. "Motorcycle Three-Wheelers in Pakistan: Low-Cost Rural Transport Services, Crucial for Women's Mobility."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12: 100479. doi:10.1016/j.trip.2021.100479
- Taylor, P. J. 1999. *Modernities: A Geo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Tseng, Y.-C., I. Cheng, and D. Fell. 2014. "The Politics of the Mainland Spouses' Rights Movement in Taiwan." Pp. 205-226 in *Migration to and from Taiwan*, edited by K.-F. Chiu, D. Fell, and P. Lin. London,

- UK: Routledge. doi:10.4324/9780203076866
- Tseng, Y.-F. and P. Lin. 2014.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Migration Into and out of Taiwan." Pp. 12-24 in *Migration to and From Taiwan*, edited by K.-F. Chiu, D. Fell, and P. Lin. London, UK: Routledge. doi:10.4324/9780203076866
- Tsibidaki, A. 2021. "Anxiety, Meaning in Life, Self-Efficacy and Resilience in Families With One or More Members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and Disability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in Greece."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109: 103830. doi:10.1016/j.ridd.2020.103830
- Tuan, Y.-F. 1974.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alsh, F. 2020. "Loss and Resilience in the Time of COVID-19: Meaning Making, Hope, and Transcendence." *Family Process* 59(3): 898-911. doi:10.1111/famp.12588
- Williams, P. J. 1991. *The Alchemy of Race and Rights: Diary of a Law Professo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Xu, J., J. Wang, and C. Li. 2022. "Impact of Consumer Health Awareness on Dairy Product Purchase Behavior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Sustainability* 14(1): 314. doi:10.3390/su14010314
- Ye, J., P.-C. Huang, E. S. Adjaottor, F.-M. Addo, M. D. Griffiths, D. K. Ahorsu, and C.-Y. Lin. 2025. "Associations between Fear of COVID-19 and Mental Health in Ghana: A Sequential Mediation Model." *Heliyon* 11(1): e41407. doi:10.1016/j.heliyon.2024.e41407
- Yu, S.-J. 2024. "Unfolding Affective Atmospher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Crisis: The Constitution of Affective Governance in Taiwan." *Geoforum* 148: 103940. doi:10.1016/j.geoforum.2024.103940
- Zhang, T.-M., Q. Fang, H. Yao and M.-S. Ran. 2021. "Public Stigma of

COVID-19 and Its Correlates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of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8(21): 11718. doi:10.3390/ijerph182111718

Zotova, N., V. Agadjanian, J. Isaeva and T. Kalandarov. 2021. “Worry,
Work, Discrimination: Socioecological Model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Central Asian Immigrant Women in Russia.” *SSM—
Mental Health* 1: 100011. doi:10.1016/j.ssmmh.2021.100011

Insiders or Outsiders? The Impact of Anti-China Sentiment on Female Mainland Spouses' Structuring Sense of Place After COVID-19 in Taiwan

Yu-Jie Han* Yu-Ling Song**

Abstrac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identity recognition, specifically examining whether female Mainland spouses perceive themselves as insiders (or “Taiwanese”) in the post-pandemic period. In Taiwan, female Mainland spouses are the largest group of new immigrants. However, experiences of social exclusion and patriarchal interference have contributed to their developing a negative sense of place. Previous studies have often overlooked how place identity impacts the survival strategies of Mainland spouses. To address this gap, the study focuses on a rural township in central Taiwan and draws on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3 respondents to investigate the lived experiences of female Mainland spouses who have migrated to Taiwan. It analyzes dimensions such as daily life and social interactions to explore how their sense of place evolved before and after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how this shift affected their national and place-based identities. This helps us to recognize the changes in their survival

* Bachelo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s1043007@gm.ncue.edu.tw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E-mail: yuling@cc.ncue.edu.tw

strategie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survival strategies of female Mainland spouses has shifted from “compromising herself” to “becoming more easygoing” after experiencing the pandemic. These shifts in strategy reflect deeper changes in their sense of place and identity. Through their long-term engagement with place practices and participation in affective politics, most female Mainland spouses now identify as “insiders” and express hope for the resumption of cross-Strait flights. Furthermore, they seek equality and peace, aiming to participate more harmoniously within Taiwanese society.

Keywords: female mainland spouses, post-COVID, anti-China, sense of place, identity